

鲁迅故乡的纪念馆

——绍兴鲁迅纪念馆的“绍兴性”品质

任金刚 卓光平



绍兴是鲁迅先生的故乡，虽然鲁迅先生在故乡只度过了人生三分之一的时光，但“祖父入狱”“父亲生病”“出入当铺”“逃难”以及被视为“乞食者”^[1]等童年经验却在他一生中留下了难以抹去的印记，并深刻地影响了他日后的文学创作。因此，研究鲁迅，绍兴是绝对绕不开的一座城市。而作为一座立足于绍兴本土的鲁迅纪念馆，绍兴鲁迅纪念馆自1953年1月成立至今，也一直很好地利用其位于鲁迅故乡这一独特的地理优势，在对鲁迅及“鲁迅文化”的研究与传播中，体现出了独一无二的“绍兴性”品质。

一、鲁迅笔下绍兴风情的展示馆

作为鲁迅文物展示的一个重要平台之一，绍兴鲁迅纪念馆区别于北京、上海、广州等地其他兄弟馆的最大优势便是其身处鲁迅故乡这一与生俱来的区位优势。从成立伊始，绍兴鲁迅纪念馆就自觉地在鲁迅文物的相关展示中追求体现这一“绍兴性”。而这一追求，具体又可以从形式

与内容两个层面来讲。

形式层面，即作为物理空间的绍兴鲁迅纪念馆的建筑特色“绍兴性”体现。作为建国后浙江省首座纪念性人物博物馆，从1953年1月成立以来，就以立足绍兴，宣传、保护、研究鲁迅文化为追求。在2003年扩建之后，在原有的鲁迅故居、百草园和三味书屋的基础上，新增了周家老台门，形成了东接鲁迅祖居，西邻周家新台门，北毗朱家台门，南临东昌坊口，与寿家台门隔河相望的完整的原生性景观建筑群落。^[2]这些绍兴独有且极具地方特色的建筑的有机组合，也成就了扩建之后的绍兴鲁迅纪念馆独此一家的鲜明“绍兴性”。

内容层面，即作为文化空间的绍兴鲁迅纪念馆对鲁迅文物展示上的“原状陈列”追求。这一追求首先体现在绍兴鲁迅纪念馆在相关文物的确认过程中严谨的考证精神。据裘士雄先生回忆，上世纪50年代，在市政府地政科从大量旧房契中发现了新台门周氏与朱氏的《绝卖屋契》，被认为确定鲁迅故居的铁证已出现。但他依然向曾参与周家新台门拆迁工程的泥工马和尚和朱寿民、朱寿康等朱氏后裔、知情者调查了解。^[3]在大量采访求证工作之后，才敢做最后的确认。当然，这一追求也体现在对鲁迅笔下相关风物的还原上。如在百草园中，他们就坚持种植鲁迅笔下

的蔬菜，力求保持原貌。^[4]

二、鲁迅故乡文物资料的理想归属地

作为鲁迅故乡的纪念馆，在鲁迅相关文物资料的收集方面，绍兴鲁迅纪念馆也注重发挥自己的地缘优势，在自己竭尽心力主动收集先生相关文物资料的同时，也受到了各级政府以及全社会对鲁迅有着千丝万缕联系与深厚感情的人士的支持。这也为绍兴鲁迅纪念馆的鲁迅文物陈列以及研究等相关工作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在这些文物的捐赠过程中，绍兴籍人士出于对鲁迅先生以及对故乡的情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其中不乏一些对绍兴鲁迅纪念馆后续发展起着关键作用的无私捐赠者。如寿积明先生于1959年7月19日作为寿家代表将整个三味书屋的产权捐给国家，才使得鲁迅笔下的这座旧式学堂成为绍兴鲁迅纪念馆原状陈列和对外开放的重要部分，也才成全了世界各地鲁迅的阅读者和研究者能够在文字之外，更加直观地感受三味书屋的真实面貌。

值得一提的是，周作人及其家属基于对故乡绍兴的深厚感情，几乎每次回家，总要捎上“见面礼”送给鲁迅纪念馆^[5]。而这一“送礼”的习惯，不仅保持了数十载，更是传承了三代人。周作人和周丰一、周吉宜、周吉仲三代人几十年如一日，向故乡的鲁迅纪念馆先后捐赠了数量众多，价值巨大的可移动文物资料。最难能可贵的是，这些价值巨大的文物捐赠都是无偿赠给绍兴鲁迅纪念馆度藏的，其对故乡鲁迅文化事业的支持可见一斑。

在鲁迅文物资料的收集上，除了上诉所说“引进来”的方式之外，绍兴鲁迅纪念馆也以迎难而上的精神，克服人手以及资金短缺等各种困难“走出去”进行实地

的调查、访问和征集。这一过程中，既需要用真诚的情感去打动文物的所有者，也需要时刻做一个有心人。目前珍藏在绍兴鲁迅纪念馆的鲁迅亲笔修改的译稿《勇敢的约翰》以及一张当年绍兴师范的《毕业证书》就是通过这一方式而最终获得的。

三、鲁迅学术研究的地域性平台

无论是包括鲁迅纪念馆在内的鲁迅故居的设计规划，还是鲁迅相关文物资料的收集整理与展览。都是为了更好地将鲁迅文化资源与绍兴城市发展有机地结合，同时更好地保护、传承以及在更大的范围内传播鲁迅文化。在这一过程中，丰富的相关学术研究成果必是其中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因素。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在几代绍兴学人的努力下，绍兴鲁迅纪念馆如今已经成长成为极具地方特色的鲁迅研究学术平台。

这一成就首先要归功于几代绍兴鲁迅研究者的辛勤耕耘。1963年，绍兴鲁迅研究小组正式成立，这是鲁迅故乡历史上的第一个鲁迅研究团体。而董秋芳和寿静涛、陈祖楠、沈定庵、谢德铤、黄中海、张能耿、周芾棠等12人则成为了本土最早的一批致力于鲁迅研究的前辈学者。他们根据自己的专业特点，很快确定了自己的研究课题与方向。代表性的成果如谢德铤的《鲁迅作品中的绍兴方言注释》、沈定庵的《鲁迅的书法艺术》、章贵的《“闰土”子孙话今昔》等。值得一提的是，期间绍兴鲁迅纪念馆还以油印的方式编印了三期《绍兴鲁迅纪念馆馆刊》，虽仅作为内部交流资料，但却也是这一时期鲁迅研究的重要成果之一。

十年“文革”期间，正常的鲁迅研究工作无法正常展开，但绍兴的鲁迅研究学

者还是做出了相对具有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如绍兴鲁迅纪念馆编印的《鲁迅研究资料》，即鲁迅年谱性质的工具书，还协助和支持山东聊城师范学院薛绥之编写出版了《鲁迅在绍兴》一书。1976年5月，黑龙江爱辉教师进修学校内部印行了章贵口述，谢德铤、周芾棠整理的《“闰土”子孙忆家史》。1977年，张能耿在香港和澳门接连出版了《鲁迅的青少年时代》《鲁迅亲友谈鲁迅》两本著作。

进入新时期以来，绍兴的鲁迅研究事业得到了空前的发展。研究队伍不断壮大，研究成果也大量增长。以1981年鲁迅先生百年诞辰为契机，绍兴的鲁迅研究事业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据不完全统计，光是出版的相关学术著作，就已接近百部。如朱恂、谢德铤、王德林、裘士雄在1981年出版了合著的《鲁迅在绍兴》；裘士雄、黄中海、张观达等在1985年5月出版了《鲁迅笔下的绍兴风情》；徐东波在1995年出版了《民族魂——鲁迅》；裘士雄在2000年出版了《鲁海拾贝》，近年来又出版了《鲁迅与他的乡人》三集以及《鲁迅与绍兴》等著作；杨晔城在2014年出版了《先生是我引路人》；顾红亚在2018年出版了《〈故事新编〉中的越文化精神》等。从以上列举的这近四十年的代表

性学术著作可以看出，曾经筚路蓝缕开创绍兴鲁迅研究事业的老学者依然笔耕不错，而新的绍兴鲁迅研究学者也已经继承了前辈的衣钵，继续前行。

作为研究鲁迅的本土学术平台，绍兴鲁迅纪念馆于1983年还推出了一本以绍兴的鲁迅研究成果、有关资料、研究文摘、报道研究动态、研究者的近况、文艺作品为宗旨的专门学术刊物《绍兴鲁迅研究专刊》。到2006年由内部刊物转为正式出版发行的学术期刊至今，《绍兴鲁迅研究》也由之前专注于推出本土鲁迅研究成果的刊物成长为逐渐走向全国，具有更大影响力的鲁迅研究学术期刊。在史料发掘，作品解读，理论研究等领域为绍兴鲁迅研究事业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极为重要的学术平台。

值得一提的是，绍兴鲁迅纪念馆立足鲁迅故乡，坚守绍兴特色，在分发挥自己地缘资源优势的同时，也十分注重将鲁迅文化向全国乃至全世界传播的工作。无论是“逢五逢十”适时召开纪念鲁迅的国际学术研讨会，还是自2013以来一年一度的“大师对话”活动，都体现了绍兴鲁迅纪念馆在立足本土，追求绍兴特色的同时，也具有将鲁迅推向世界的国际视野和责任担当。

注释：

- [1] 钱旭初：《作为城市符号与文化资源的绍兴鲁迅纪念馆》，《鲁迅研究月刊》2014年第7期，第55页。
- [2] 施晓燕：《鲁迅专门纪念机构的历史及现状》，《上海鲁迅研究》2011年第3期，第55页。
- [3] 裘士雄：《一切为了鲁迅——我在绍兴鲁迅纪念馆工作32年》，《鲁迅与绍兴》，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9年版，第227页。
- [4] 同上，第227页。
- [5] 同上，第226页。

（作者单位：绍兴文理学院鲁迅研究院）